

## 三種「存在與虛無」的「台北異鄉人」命運分析 一論〈謫仙記〉<sup>1</sup>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sup>2</sup>、〈那一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sup>3</sup>

歐崇敬\*

### 摘要

困於存在與虛無架構中的白先勇之台北人，因其虛無而始終成為使無法將他鄉化作故鄉，終乃台北會成為一個悲慘世界；人陷在回憶、往事之中，而不能是往事如煙，著實悲慘；白先勇既同情這些異鄉人，卻自己也處於存在與虛無的架構中，無可自拔。再多的物質、學歷、繁華、高牆大院，也不能與心靈的幸福與喜悅相提並論。回首面對現實，或是開展新的未來，原來在處身於結構中牢不可破的臺北人世界裡竟如此艱難。臺北人必須運用差異來瓦解「異鄉人」或「存在與虛無」的同一性哲學。

關鍵字：臺北人、異鄉人、存在、虛無、白先勇。

---

<sup>1</sup>見白先勇，《謫仙記》，1991，台北，水牛出版社，一版，第239頁~271頁。

<sup>2</sup>見白先勇，《臺北人》，1984，台北，爾雅出版社，新二十版，第71頁~90頁。

<sup>3</sup>見白先勇，《臺北人》，1984，台北，爾雅出版社，新二十版，第91頁~109頁。

\*南華大學世界禪學研究中心主任

---

## An Fate Analysis of outsider in Taipei with three of Being and Nothingness

Ou,Chung-Ching

### Abstract

Taipei people that Hsien-yung, Pai describes, they are stranded in the structure of being and nothingness, so can't change the strange land into homeland all the time. So Taipei is turned into one miserable world. Because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in remembering, past event all the time. Hsien-yung, Pai sympathizes with these outsiders, but because he himself is unable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is being and nothingness. So, even a lot more of abundant material comforts can't bring the happy and happiness of soul either. To Taipei people, no matter face reality or march toward new future, it is very difficult. This text uses the view of ' the difference ', to discuss the philosophy questions of ' outsider in Taipei ' or ' being and nothingness '.

Keywords:Taipei People, outsider,being, nothingness,Hsien-yung,Pai

## 三種「存在與虛無」的「台北異鄉人」命運分析

—論〈謫仙記〉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那一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

歐崇敬

### （一）前言

用存在與虛無、異鄉人三個角度來看《臺北人》，白先勇筆下的三篇小說主要是希望開展出一種後現代及解構的閱讀，同時也能超越傳統的文本分析或是結構式的閱讀理論分析；進而尋找出差異與神可能的臺北人。

### （二）〈謫仙記〉

〈謫仙記〉同時也收錄在《臺北人》<sup>4</sup>裡，它的背景不是在台北而是在美國。這意味著台北人的意涵延伸到海外的一種華人存在，作者也把它視為台北人的範圍。這個〈謫仙記〉的背景，事實上是有一個真實的故事作為基礎，也就是太平輪的沉船事件。當時太平輪沉船事件上獲救的只有三十多個人，罹難的有八、九百人以上，同時也造成了上海船公司、保險公司的倒閉，裡面有相當多上海貴族在前往台灣的過程裡面死在船上，中間就發生非常多生命的令人感嘆的事件，這是〈謫仙記〉跟《臺北人》最有關的核心事件。船上包括中國國民黨的重要的黨史資料，中央銀行相關的帳本等等。一部船的沉船，當中發生許多大時代的故事，包括原本有人搭了這艘船，提前換了船票，例如知名的教授鄭培凱當時僅週歲，他本來搭這艘船，後來他的母親得到一個飛機的位置，就把他抱上飛機，就逃過這個難關。

或者是以前立法委員，後來的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全家，本來也想搭這條船，後來因為他的二女兒發燒了，沒辦法搭這個船，因而就保住了命。那當時也有好幾家人跟她們同進同出，也就逃過了這個難關，包括王大任委員。也有人本來不是搭這艘船，可是卻意外的上了這艘船，最有名的是當時南京音樂院的院長，也就是當時國家音樂學院的院長吳伯超，他女兒是後來師大音樂系的教授吳漪嫻，當時吳漪嫻教授非常期待他父親的到來，到了岸邊卻發現沒有人來，原來是船沉了，當時吳以嫻才十七歲。吳伯超當時是要來考查如何把南京音樂學院搬到台北

<sup>4</sup>見白先勇，《謫仙記》，1991，台北，水牛出版社，一版，第239頁~271頁。

來的事，順便跟他的女兒共度。

吳伯超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曾指揮過千人大合唱，萬人大合唱，並曾經爲了邀請北京的知名教授到南京來下跪乞求名師到南京來；然後晚上提著燈籠巡視學生的宿舍，可說是知名的音樂教育者，過世的時候才四十五歲；而且是一個留德的音樂學家，他之所以會上船，是因爲他遇到船上的三副，那個三副就把船位讓給他，說反正他要值班，所以不用睡了，結果哪知道值班的那個三副，因爲打瞌睡而且喝了酒，所以沒有注意船況，船就和迎面而來的建元輪撞上了，撞上後建元輪立刻沉船，太平輪自以爲沒事，還繼續向前走了半小時，才開始滲水，最後大家幾乎都罹難在上面，當然有一些人很幸運獲救，獲救其實也很淒慘，因爲親人都罹難了，那種感受是難過的。其中有些人到了台灣，從此所有家當不見了，變成一窮二白，然後從貴族般的生活就變成非常農家的生活，連抽水馬桶都沒有，連自來水都沒有的日子，甚至到台灣來他還是保持著自己用紗布和蒸籠去設法烘一個蛋糕，爲自己設法磨一點咖啡豆，沖一杯咖啡喝下午茶，然後上海的儀式可能移到苗栗頭份的一個鄉村，繼續保持這個儀式，出門的時候還會記得穿旗袍，到新竹去找揚州師父作旗袍，這樣一連串非常多的故事，其實始終圍繞著也圍繞著來到台北的異鄉人的世界裡。

〈謫仙記〉就在這個背景底下做了一個創造，當然他虛構了一個人物，就是裡面的女主角—李彤。李彤和他幾個姊妹淘都到美國留學，而且她們是那樣的貴族階級，甚至貴族到比哈佛的就讀生可能還要更貴族，也就是她們存在著一樣特別的身分和品味和存在感受和一種命運，但是她們到了美國以後，或者是家境有了變化以後，整個世界變了。這個世界變了，但她們原先的生活的儀式、生活的習慣並沒有改變。雖然生活儀式這個沒有改變，而現實生活在經濟基礎上 and 物質上可能又有改變，這就造成了主人翁的困境，就產生了存在上的虛無感受，這種存在的虛無感受是難以言喻的，是難以自我分析的。

透過寫實主義的手法，事實上很難去詳細說明到底爲什麼，而只能用一種寫實條件式的烘托，然後呈現出這種存在的困境。人們看到〈謫仙記〉，一開首，她們說「她們在學校裡晚上下餐廳時，一逕是穿著晚禮服」<sup>5</sup>，這個晚禮服代表

<sup>5</sup>同註一，239 頁第二行。

一種階層，代表一種品味，代表一種自我要求，當然代表一種儀式，也代表上海她們接受西方文化一種遠比其他地方更為提早的情況。比起上海來，當時台北像是一個破落的小漁村，雖然那個時候已經經過日本的統治，有總督府、有台北帝國大學，但是終究是無法跟上海那個十里洋場相提並論，人們當然已看不到當時的台北人或者是當時的台北本地人或是台北的日本人，達到這種晚上下餐廳的時候就可以穿著晚禮服，而且一逕穿著晚禮服，這是沒有的。讀者看到這樣的一個存在方式，延伸在美國也好或是台北也好，她們那種所謂上海的貴族中學所形成的班級的這種氣氛，深深的印在她們身上，這些人可能是官員的孩子，或者本身就是官員，或者是富商的孩子等等，而且她們其實在上海的時代就已經習慣開舞會，而且有喝外國酒的習慣，她們甚至對外國酒會有所品味，會有所評價。在小說裡頭，他就嫌香檳酒太淡了，像水一樣。

對於一般的台北人或者本地人，或者直到二十一世紀的台北人或者所有的台灣人，特別是在讀大學的學生來講，大概還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評鑑酒，然後直接對哪一種酒說出他愛好的原因。如同我們過去沒有看過百老匯或者任何一種音樂劇的時候，我們說不出我們對《貓》<sup>6</sup>劇的感受，比如說，當人們去排隊的時候，聽到前面有一個小孩子說，我再也不喜歡看到那個貓一直盯著我唱歌的感覺，他只是脫口而出，可是你會感覺到一種羨慕和一種落差，他似乎對這個《貓》劇那麼的熟悉，而我們可能 2007 年才聽過什麼叫《貓》，然後是基於好像大家都必須要來，於是就來看此劇，證明我是有這個消費能力，可是那整個文化的氛圍是有巨大的差異的。這種差異的對比在「謫仙記」裡面，她們這樣的上海和貴族中學裡所出現的這種生活型態，這種生活型態不止移到了美洲，當然也移到了台北，在少數族群裡，而這樣的一個少數族群，事實上也不是絕對的少數，算算也有幾十萬外省人，他們其中更有數萬人，以這樣的生活方式互動著。

人們知道，從社會學的角度人只要超過三百個朋友的往來，他大概就很難再去注意到三百人以外的人，所以他的世界肯定就圍繞在那三、四百人，甚至再多一點的世界裡面。但在他們的世界裡面，其實聽不到別種台北人，甚至聽不到別的本地人的聲音，亦也許可以看到，但其實乃是不熟悉的。所以他們可以說，在

---

<sup>6</sup>指韋伯的音樂劇。

台北的這個環境來講，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異鄉，而他們也有另外一種虛無的感受，這種虛無感受難以言喻，因為他們跟這個土地不夠密合，而且他們建立一個有點半自給自足，互相往來的小的生活圈。

這種生活圈，人們當然也可在二十一世紀找到非常多人為自己建立的生活圈來類比，比如在宗教的世界裡面，或者在一些社團的世界裡面，比如說在牌友的世界裡面，就是一種生活圈。或者整日活在球友的環境裡面的生活圈，2007年2月才報導有一個辜仲諒所創造的球隊，裡面都是有錢階級，有一對夫婦擅長股票，結果就吸金數十億元，把裡面整個球隊的人都吸金完畢，這些人就活在那個生活圈裡面，才會發生那樣獨特的事情，對一般人來講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這樣簡單的會被騙了，這裡面當然有著某種獨特的生活的邏輯。

再看到小說中，人們看到她們的儀式：「在1946年裡面出國的那一天，竟然可以不約而同的穿上一襲紅旗袍」<sup>7</sup>，換句話這個儀式比人們想像的更儀式化，而且人們可看到旗袍原來其實是旗人在穿，延伸到現代是中國婦女在交際場合的代表服裝。那麼這樣的服裝，後來也移到了台北，進而同時以這樣的服裝進軍到所謂的國際場合，這一篇〈謫仙記〉裡頭其實也隱約的說明，進入國際場合裡面的那種異鄉感，另一種台北的國際的一種異鄉感受。在小說中可以看到<sup>8</sup>，她們在那樣的美國學校裡面，甚至有人被選為「五月皇后」<sup>9</sup>。換句話說，她們簡直是達到貴族中的貴族了。可是，這個女主角李彤，沒多久家裡面就出了事，這個出了事，跟上海要撤退到台北，有著緊密相連的關係，所以，也就是〈謫仙記〉為什麼進入台北人的真正原因，可是其父母並沒有真正撤退成功，因為他們到吳淞口船就沉了，船沉了以後，事實上當然是整個生活經費和各方面就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基礎，這樣一個生活的巨大改變，作者只有一個很簡單的交代，「她們都一致覺得李彤却變得不討人喜歡了」<sup>10</sup>，這個「不討人喜歡」是一個客觀的感受，也就是他的命運變得不同於以後，連外在觀看他的感受也改變了，而且這個改變是不被喜歡的，對主人翁而言當然是有所感受的。可是，主人翁在他主角的世界

<sup>7</sup>同註一，第240頁第二行。

<sup>8</sup>同註一，第241頁倒數第三行。

<sup>9</sup>同註一，第241頁倒數第二行。

<sup>10</sup>同註一，第242頁倒數第五行。

裡面，他對自己的評斷有沒有改變呢？沒有，他依然堅持著那個身段，依然堅持著那個自我評價，很簡單，「李彤不僅自以為漂亮，她著實美得驚人」<sup>11</sup>，作者更接著說，「像一輪驟從海裡跳出來的太陽，週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發疼的。」<sup>12</sup>接著說明她的身材、五官等等，甚至是頭髮，這個花了半頁的功夫，去說明這樣的一個女性。

說明這樣的女性，主要是在界定她所謂存在的價值，可是她原先存在意義世界裡面所應該獲得的對待與代價，那這對於她的生命，家裡面突然遭逢變故，父母親都沉船，家當都不見，都沒有什麼後的落差，全在不言中，這是小說的藝術，它只用一個結果告訴讀者，而把中間的轉折都留給你去想像。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作者又花了很大的筆調去說明她生活中有非常多細節的儀式，是什麼呢？人們看到她們裡面打麻將、打撲克牌、賽馬、喝酒、舞會，而且所有人的對白環繞著這些話題在過日子，這也是說明一種上海人離開了上海以後，可能是住在台北，可能到國外，他繼續堅持原有生活的生活方式，他其實是跟環境有著很大的疏離，進而一定程度產生的異鄉感。那麼，女主角有沒有改變她的生活呢？沒有，她繼續，我們看到故事中<sup>13</sup>，她仍然穿著一襲雲紅紗的晚禮服，而且討論著香檳，討論著飲酒文化，也大談賭馬。什麼意思呢？這說明人的命運受制於環境的結構，人的所有對白也受制於環境的結構，也就是一種結構化的思想，主人翁所說的話總是符合結構的內部的變化，也就是說人難以脫離結構之外，換句話人的情緒也就脫離結構之外，但是，人在現實生活上又難以跟結構作準確對應之後，那個存在的虛無感就出現了，那個異鄉和疏離感就會出現。

白先勇花了非常多她們在討論生活的各種方式的對白<sup>14</sup>，包括李彤下場亂押賽馬的馬注等等，這個意思也在說這個生活的基本儀式事實上難以改變，文中就出現以作者第一人稱的她的太太<sup>15</sup>，在紐約的時候患了失眠症，那我們可以看到異鄉生活所造成的不知名的困頓，事實上是存在的，這也就說明了白先勇把他放入異鄉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異鄉之中會有難以說明的精神的壓力會產生，至於是

<sup>11</sup>同註一，第 243 頁第七行。

<sup>12</sup>同註一，第 243 頁第七行。

<sup>13</sup>同註一，第 247 頁。

<sup>14</sup>同註一，第 254 頁之前。

<sup>15</sup>同註一，第 355 頁。

什麼原因，在那個時代，在那個六〇年代裡面，其實是難以言明的。那麼人又要繼續保持著他在原有的上海上流社會的生活，事實上他總是非常辛苦的，另一邊如果到了美國還要面對所謂西洋的文化，包括進入西洋的酒的文化，而不是東方的酒的文化。我們又看到她們說「沒有好牌多麼洩氣，我的耐性越來越壞，玩撲克牌也覺得沒有甚麼勁道了。」<sup>16</sup>這也說明一種虛無狀態的進入，那終究只能在對話裡面再去說「再替我去弄杯酒來好嗎？」<sup>17</sup>那這些話裡面都蘊含著對存在的無奈，對命運的無奈，和一種虛無、不耐煩、煩躁。終於到了小說的後半段，李彤就在前往歐洲的路上死了，並且是在威尼斯跳河自殺，沒有理由，沒有遺書，所有的理由都在前面所有的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對白。

如果讀者想知道理由，就必須要從對白裡面去品味出主角後面那個生活世界，後面那個命運感受，是什麼決定了他自殺的命運，毫無疑問是一種存在的虛無感，而這種存在的虛無感，他其他的幾個好朋友，有沒有同時具有呢？作者雖然沒有交代得很清楚，但作者自己的太太，同為李彤的好友之一，卻在最末段的時候，有了些許的透露，在混亂之際，她們先是賭局越來越大，大家開始遺忘的去討論李彤的死因，作者花了整整兩頁的功夫，來說明賭博的過程，越是如此地虛無莫名其妙，而它就越顯得虛無和蒼白。

到了最後終於他們離開了聚會的場合，經過了百老匯，另一主角自己要求他太太把窗戶關起來，他太太卻說「悶得很，我要吹吹風」<sup>18</sup>，作者自己終於也忍受不住了，說了：「關起窗子，聽見沒有？」<sup>19</sup>他也發現他的太太在他身邊哭泣了起來，最後他只用很簡單的方式說，他感到他非常能夠體會他太太那股深沉的、空洞的悲哀，並且他認為那份悲哀是沒有辦法用話語慰藉的，他認為她這一刻所需要的是孤獨和尊重。

這就讓人們想起來，之前有一部知名的傳記，章詒和小姐所寫的《往事並不如煙》<sup>20</sup>，在時報的《往事並不如煙》裡面，章詒和小姐說，有時候悲傷也是一

<sup>16</sup>同註一，第 361 頁第一行。

<sup>17</sup>同註一，第 361 頁第八行。

<sup>18</sup>同註一，第 370 頁第三行。

<sup>19</sup>同註一，第 370 頁第六行。

<sup>20</sup> 2005，臺北，時報。



種權利，換句話說，人能夠被尊重或者被容許孤獨的悲傷也是一種權利，那麼這種更深沉的、孤獨的悲傷，外面圍繞的當然是絢麗的外表，是那個來自上海的貴族的感受。對於本地人，對於這些三餐還要吃著番薯簽的本地人，其實怎麼想也想不懂，為什麼這樣的千金小姐，還能夠穿著晚禮服，還能夠賽馬、飲酒、打撲克牌、打牌，這個在紐約的千金小姐，為什麼到歐洲去，在威尼斯要跳河自殺呢？

如同人們實在想不懂，為什麼列名百大富豪的人，也會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掏空公司，亡名海外，而且這二十年來，這樣的人卻不在少數，恐怕超過五十位以上，世人總是想不懂。原來人到了一個大時代，到了一個變遷的局面，進入一個命運的鎖鍊的安排以後，它就不再只是吃得飽與否可以計算。命運的意義怎麼去計算，只有以個人為座標，它沒有辦法和別人作度量，可是跟他同一個族群的人卻可以感受到，那個類似的哀愁。換句話說，存在的條件的確不僅僅只是物質，存在的條件還有非常多複雜的基礎，但是存在一旦進入了虛無狀態，和進入一種無根狀態，那種苦痛，那種異鄉感受，是難以言喻的一切。都可能在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選擇自盡，這種自盡當然也像玉嬌龍到了武當山以後<sup>21</sup>，從武當山上直接跳下來，接受他的男朋友的祝福一樣，也當然也像李慕白<sup>22</sup>想退出江湖，把青平劍給貝勒爺那樣的感受一樣，說不出來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人存在真正遇到的痛苦，最大的挑戰或許不是物質上的缺乏，而是精神上的困頓，才是更大的挑戰，如果物質的匱乏是這麼大的挑戰的話，那麼在戰爭中那種物質匱乏的過程似乎大家都應該選擇自盡而不選擇逃難。可是大家在三餐有點不繼的情況之下，竟然也都能夠努力的活過來。可是在小說裡面說她賺的錢比誰都多，為什麼她要死，這就奇怪了，不缺錢，只是家裡不再那麼有錢，老朋友都還在，又為什麼要死？這就是我們說的，白先勇裡面所顯示出的張力，那個台北異鄉人的張力，在這裡它呈現出存在與虛無的那種虛無感，另一個虛無感的另一種對照，是在台北知名的被拍成電影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存在與虛無的那種虛無感受，而追求一種甜蜜的故鄉的一種需求。接著可以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sup>21</sup>指李安的《臥虎藏龍》一片。

<sup>22</sup>出處同註 21。

### (三)〈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金大班來自上海，這又是白先勇最重要的主流敘事對象；要不來自上海，要不來自南京、桂林，這是他台北人裡面的主流台北人，這個自命不凡的舞女領班，原先也有一些理想，但是面對存在的虛無感，主人翁終究必須要克服，那這個克服最終的手段是向現實低頭，走向一個可靠的、能計算的方案，並找到可以讓日子過下去的方法；但不代表這個人失去一切的理想和幻想。從她的角度來說，舞廳就是她的異鄉的一個縮影，所有進到舞廳的都是過客，包括她自己也是過客。而她總是想要回歸她過去的歲月，不管是那個光榮的過去，或者是理想的追尋的往事，但是總不可能，而且她總是要面對這麼多又臭又髒的客人及錢財，那她在看到她的同事朱鳳，那種未婚懷孕，然後面對生活的困境，她其實產生了一種生命的共構感，那她那個存在的虛無感就暫時會出現，這種生命的共構感，又是一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受，又是同一個《異鄉人》<sup>23</sup>的感受，所以這種感受使得人毫不吝嗇的給了一個鑽戒，重點不在於這個鑽戒的價值高或低，重點在於那種情義相挺的感受，雖然她未必喜歡朱鳳這個人。然而歲月總是無情的，金大班這個從上海來的舞女，如今也已經四十歲了，她不能再堅持她所謂的理想的價值，她只能無可奈何的選擇現實，而且能計算。但不代表她完全拋棄了那個存在的虛無感，在文中<sup>24</sup>她面對那個年輕人，白先勇用了非常綿密的手法去敘述了那個年輕人的感受，就是說明了她根本就遺忘了她自己的心靈世界，只是他鍛鍊出一個新的、有韌勁的能力。這個能力是一種生存能力，這個能力是面對存在虛無感的能力，因為如果存在的虛無繼續襲擊她，繼續圍繞她，終究只會使她活不下去，終究只會使她走不下去，可是人生畢竟要走下去，否則就會像〈謫仙記〉裡面的李彤，也就會走不下去。金大班在那樣的環境裡面，那種訓練更為老練，更能夠告訴她，活下去才有尊嚴，所以她沒有選擇故事中跑船的年輕人，她選擇的是確實的可以活下去，更明確說明，她選擇的是一個可以計算的存在價值，至於這個可以計算的存在價值，寄託在誰身上，只要能忍受、能過去也就可以了。但

<sup>23</sup>指卡繆著，《異鄉人》，2000，台北，志文出版社。

<sup>24</sup>同註二，第89頁。

是她是否已經完全遺忘了，她想要追逐的夢想的心靈感受呢？沒有。她仍然在舞池的最後一夜裡面去尋找她愛情的故鄉，她存在的故鄉，她仍然希望在舞池的最後一天裡面，解除她做為台北異鄉人的那種異鄉感受，回到一個甜蜜的故鄉。

這種甜蜜的故鄉的追尋，即便到最後一天的舞池，仍然沒有放棄，我們不得不稱讚白先勇的手法，說明一個強勁的生命力，一種不放棄理想的生命力。可是又能夠貼近現實，他同時也為上海人做了一個註腳，上海的女人向稱厲害，向稱能計算，向稱能幹，怎麼個能幹法，金大班給了人們一個示範，我們在裡面看到，白先勇這麼說：金大班把他的頭緊緊的摟進她懷裡，所謂的他的頭指的是那個年輕人，而且是乳臭未乾的年輕人，接著說「貼在她赤裸的胸房上」<sup>25</sup>。這是何等的浪漫追尋，「兩行熱淚，突的湧了下來。那時她心中充滿了感激和疼憐，得到了那樣一個羞赧的男人的童貞。」<sup>26</sup>她其實沒有真正跟他發生性行為，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她認為她擁有了，擁有她真的想要追尋的。接著說「一剎那，她覺得她在別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玷辱和褻瀆，都隨著她的淚水流走了一般。」<sup>27</sup>所以她在最後這個舞池的異鄉，獲得了救贖，解脫了她存在的虛無感，雖然只有片刻，可是她用了一個「剎那即永恆」的手法，給了自己安慰，白先勇接著說「她一向都覺得男人的身體又髒又醜又臭，她和許多男人同過床，每次她都是偏過頭去，把眼睛緊緊的閉上的。可是那晚當月如睡熟了以後，她爬了起來，跪在床邊，藉著月光，痴痴的看著床上那個赤裸的男人。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纖秀的腰肢上，她好像頭一次真正看到了一個赤裸的男體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來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肉體，竟也會那樣發狂般的痴戀起來的。」<sup>28</sup>換句話說，她藉著這樣的一個描寫，在說明她真正追尋最深刻的內在是什麼，於是他後面又做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敘事，「當她把滾熱的面腮輕輕的偎貼到月如冰涼的腳背上時，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來了。」<sup>29</sup>然後這個回憶又到了現場，藉著這個年輕人，她完成了她的浪漫，沒有完成的夢想，解決她存在異鄉，解決她

<sup>25</sup>同註二，第 89 頁第九行。

<sup>26</sup>同註二，第 89 頁第十行。

<sup>27</sup>同註二，第 89 頁第十一行。

<sup>28</sup>同註二，第 89 頁第十二行。

<sup>29</sup>同註二，第 90 頁第三行。

的虛無，雖然離開的最後一夜的舞池，她可能仍舊虛無，畢竟她曾經在這個過程中解決過。於是白先勇又用了金大班體現的另外一個側面的台北人，而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台北人。

#### (四)〈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

在這個「存在與虛無的體現」裡面我們討論的第三篇是「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主角王雄他是來自大陸的邊緣的異鄉人，而且在台北，所以是台北的邊緣的異鄉人，他完全是非主流的，他只是個佣人，他的身上，嚴重的受到外形的歧視，以及權力的控制、慾望的壓抑，所以他的存在其實是密不通風的，毫無出口，他原先的出口在他的家鄉，他有未婚妻的情人與他熟悉的故鄉，那一切都足以使他有正常的慾望的抒發的管道，有正常的身體的發展，有正常命運的落實和活絡。無可奈何，時代變遷，讓他到了一個異鄉，這個異鄉，他寄居在他人籬下，他唯一可以投射的對象，是他東家的女兒，而他只想要投射，他並不要踰矩，這個投射就是載著他去上學，但當這個投射也被遏止以後，他就試著從其他的管道來對這個東家的女兒好，而他依然要節制他的慾望，可是他還是要找一個投射的出口。

於是，他是著用各種方式，包括他所留下的遺物，都是在關切這個東家的女兒，也都是在投射他心中的情人，也都是在揮發他內在的慾望，同時也在反制他的身體，那個所受控於權力的結構。讓他徹底破滅的是那兩條金魚的水缸，和那兩條金魚的死亡，赤裸裸的在地上，不被珍惜，對東家的女兒，他毫無抗拒能力也沒有批判能力，也沒有謾罵能力，他又受制於傳統的道德，也不能去做任何的追尋，結果他連最後一點的象徵、投射的機會都破滅，終於走向徹底的自閉，這個走向徹底的自閉是將他的慾望作完全的封鎖，讓他徹徹底底的成爲一個冷漠的異鄉人。

這個冷漠的異鄉人，事實上是禁不起再有任何的挑戰，而另外一個代表慾望出口的人物，然後活潑的喜兒卻刺傷他，刺傷他的原因，正是他東家女兒拒絕他，也是拒絕他慾望投射的關鍵原因，就是那個符號「大猩猩」，這個「大猩猩」徹底的瓦解他在異鄉中唯一的支柱和存在的依據，最後更瓦解他封鎖他自己的慾望

的可能，也就是說他連選擇沉默、選擇自閉的機會都不存在，他徹底的被赤裸裸的解剖在異鄉，在一個他的主人，他完全受制的權力的環境的權力結構之中，他的慾望不但沒有出口，也沒有尊嚴作自保的能力。白先勇繼承了《紅樓夢》、《西遊記》的描述手法，運用在對於大陸人士到了台北，成為台北異鄉人的各種側寫，他發現慾望的抒發在於異鄉，在於每一個不同的人物身上，事實上是值得關切的，在一個微不足道的王雄身上，也產生了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情，表面上的驚天動地是喜兒被強暴在花叢裡，而且被凌虐，甚至是被毆打過。

事實上他更說明一種無根者，無法找到慾望出口者，並且受制於權力結構被牢牢的封鎖著的這種虛無感和無奈，這種存在的徹底虛無感受終究選擇暴力來了結。兩種暴力，第一個是對他者的暴力，是對挑釁者的暴力，他還是遵照倫理，沒有去碰他老東家的女兒，甚至保存好部分要給她的東西，另外一個則是對於自己的瓦解，象徵著對於這個慾望的結構，對於虛無的顛覆和厭棄，對於權力掌控的否定，對自由的追尋，而他的自由是什麼呢？在裡面這樣寫著「在他箱子裏，翻出了一大包五顏六色的玻璃珠子來，是那次他替麗兒串手釧子用剩的。」<sup>30</sup>連用剩的玻璃珠子他都存了起來，表現了他對麗兒所投射的他的故鄉情人的愛意是多麼濃郁，和不可言喻，甚至無人可說，一種愛意，一種慾望，一種深沉的孤獨無人可說，那種力量的巨大，難以想像。於是「大猩猩」三個字就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成為他生命中難以防守的破口和死穴，終究他只好破繭而出，為自己殺出一條血路。白先勇對這條血路做了一個說明，「當我走到園子裏的時候，卻赫然看見那百多株杜鵑花，一毬堆著一毬，一片捲起一片，全部爆發開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鮮血，猛地噴了出來。」<sup>31</sup>這段他說明了慾望的不可遏止。「灑得一園子斑斑點點都是血紅血紅的，我從來沒看過杜鵑花開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過。」<sup>32</sup>這裡很明確告訴世人：憤怒。「麗兒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園子裏捉迷藏，她們在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叢中穿來穿去。」<sup>33</sup>也就是在慾望之海中自由的奔跑。「女孩子們尖銳清脆的嬉笑聲，在春日的晴空裏，一陣緊似一陣的盪漾著。」

<sup>30</sup>同註三，第 108 頁第五行。

<sup>31</sup>同註三，第 108 頁的倒數第二行起至 109 頁。

<sup>32</sup>同註三，第 109 頁第一行。

<sup>33</sup>同註三，第 109 頁第二行。

---

<sup>34</sup>這個手法非常具有象徵意味，也對那個死了的王雄產生了虛無般的對照。

(五) 結語

困於存在與虛無架構中的白先勇之台北人，困其虛無而始終成爲使無法將他鄉化作故鄉，終乃台北會成爲一個悲慘世界；人陷在回憶、往事之中，而不能是往事如煙，著實悲慘；白先勇既同情這些異鄉人，卻自己也處於存在與虛無的架構中，無可自拔。再多的物質、學歷、繁華、高牆大院，也不能與心靈的幸福與喜悅相提並論。回首面對現實，或是開展新的未來，原來在處身於結構中牢不可破的臺北人世界裡竟如此艱難。臺北人必須運用差異來瓦解「異鄉人」或「存在與虛無」的同一性哲學。

---

<sup>34</sup>同註三，第 109 頁第三行。